

宋喜坤 著

萧军和哈尔滨

《文化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喜坤 著

萧军和哈尔滨

《文化报》



文化報

新年獻詞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宋喜坤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6522 - 5

I. ①萧… II. ①宋… III. ①萧军(1907~1988)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9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曲弘梅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李 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关于《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的话

宋喜坤博士把他的论著《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送来，嘱我说几句话，我自然承诺下来。这有几层因由：一是，萧军与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几分关联。记得在1947年，我去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的时候，萧军就是我们学校的文学学院院长，虽然当时未能一面，但是他的书和稍后的《文化报》，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读起《八月的乡村》来，感受着东北人格外亲切的泥土气息，感受到萧军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鲁迅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蛸，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到的，而且是有所得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直观、凝练的语言，萧军在东北烽烟中，粗犷、沉滞而绝不屈服的神情，使我们这些东北的青年感到亲切的和由衷的诚敬。

二是关于《文化报》事件。萧军主办的《文化报》是1947年5月4日在哈尔滨创刊的；到了1948年5月1日，在同一个城市又出现了一份由东北局委托，东北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生活报》。《文化报》的读者群是以“学生、店员、职员，一般小市民为主”，注重青年人的教育启蒙的刊物；比较来说，《生活报》则是“专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就作者角度看，《文化报》是以非党作者为主的民间性的群体；《生活报》则多系党员作家组成的文化群体。应该说，这两者互相促进，会预示着东北文化的美好未来。可是谁又想到，到了1948年顷，却出现两者相向，《生活报》展开了对《文化报》的大批判运动。一时之间，政治思想和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仅在一个月内，《生活报》竟以百篇批判文章指向萧军及其《文

化报》，可见势头的猛烈。其结果是在1949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出面作出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指称他反共、反人民，挑拨中苏关系，并且“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资助”，要求东北各地的机关、工厂、学校按照指示开展大规模的萧军反动思想的批判活动。这时节，我仍是大学里的一名学员。在学校的组织中，也同样以正式学习的模式，卷入到斗争的旋涡中来。

不过，历史从久远的意义来说，是公允的。但它却是在动态中运行的。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行动；第二，指对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和描述”。因此，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后，经过沉淀，在不同时代、时期，不同的人们中间，会有不同的解读模式和结论。萧军和《文化报》事件，也是如此。用宋喜坤的话说：“萧军及其《文化报》，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朝花夕拾’，一回回的恶意把弄玩味，一轮轮的陪榜批判之后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时刻。”这便是1980年4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复，由北京市委发布的《关于萧军同志的复查结论》，肯定了



萧军（高莽的速写）

萧军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提出要萧军恢复名誉，重返文坛，发挥所长。至此，萧军已经是告别文坛32年73岁的老人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敏感的香港报刊（《开卷》），不仅发表了魏子明的《不肯屈服的萧军》一文，还刊载了董玉的萧军专访以及大幅萧军的照片、高莽给萧军的速写。一切似乎都步入了常态。

那么，历史是否至此会戛然而止了呢？否。只能是告一段落。因为历史在

沉淀与深化中会不断地演化出新的命题；会有不同的声音和解读的方式。史实也会在真实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喜坤的论著，应运而生，构成21世纪的现代版。对于过去的研究来说，它是一个传承，也是一种拓新。在我的解读中，一，它本真地探寻了萧军及其《文化报》的史料。近代学者梁启超有言，“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材料，以为研究的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史料的精心考释，构成宋著的显著特征。诸如，《文化报》的出刊日期，萧军在《文化报》著录的次数，乃至某人批判萧军时文章的篇名和次数，都考察得精细到位。这给予论著以切实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论著的附录部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二，论著以萧军和他的《文化报》为中心，纵横地构建成一个历史的思想和文化流脉。这就在个别中容纳着一般。在萧军的文化足迹中，上溯到“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和鲁迅的关联；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的东北文化和思想的潮流。这就在论著中，或隐或显地梳理出中国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史来。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交互作用，使得文本充实而又丰富起来，从而具有了它的生命力和可读性。

三，它对某些命题的演化探求，同样闪现着自我的创新意识。在这方面，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的形成与阐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从含义到建构过程以及多种表现，都有所表述。如果说，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系统地阐发中；那么，第五章，“《文化报》事件”引发的思考，则更具思辨的理性精神。其中的某些见解，自然尚待历史的考释，但勇于探索的精神，给予本书以不少的可读性。如果说，前面的时代、历史性的梳理，尚属于事理的阐发，那么，有关“解放区重构的”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冲突，其间宗派主义的考释，以及萧军的性格及命运的言说，则由表及里，比较细密地论证了这次事件的历史。正是如此，这一研究成果，对于重写现代思潮史，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匆匆地读过这部论著，浓郁的历史记忆，再现在生活过的海洋中，只能略述所怀，权且为序。

孙中田

2014年9月9日于长春

目 录

序 关于《萧军和哈尔滨〈文化报〉》的话	(1)
引言 白云原自一身轻	(1)
第一章 萧军及其新英雄主义思想	(7)
第一节 新英雄主义含义、表现及成因	(9)
一、新英雄主义含义	(9)
二、新英雄主义表现	(10)
三、新英雄主义成因	(15)
第二节 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过程	(21)
一、新英雄主义思想建构	(22)
二、新英雄主义行为构建	(25)
第三节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的文学创作	(29)
一、新英雄主义与散文	(30)
二、新英雄主义与小说	(34)
第四节 新英雄主义的时代反思	(37)
一、新英雄主义的进步作用	(39)
二、新英雄主义的历史局限	(41)
第二章 萧军与东北新启蒙运动	(43)
第一节 启蒙精神的原始构建与正本清源：五四启蒙和 新启蒙	(44)
一、五四启蒙运动	(46)
二、新启蒙运动	(50)
三、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	(55)
第二节 启蒙精神的隔代传承：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60)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	(61)
二、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67)
第三节 东北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萧军及其新启蒙实践 ...	(74)
一、萧军对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	(75)
二、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得失	(83)
第四节 继承与扬弃：新启蒙实践的文化哲学思辨	(88)
一、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内核——五四启蒙	(88)
二、萧军新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双轨道启蒙	(91)
第三章 《文化报》的新启蒙文学实践	(97)
第一节 民间立场的文化突围：《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 生成和传播	(98)
一、《文化报》的非党文人集团	(99)
二、《文化报》与《文艺月报》、《解放日报》副刊	(103)
第二节 两种启蒙的和谐共存：《文化报》的“双轨道” 新启蒙实践	(108)
一、内道：五四思想启蒙	(109)
二、外道：革命思想启蒙	(116)
第三节 战斗杂文的文体选择：萧军在《文化报》上的 文学创作	(120)
一、散文：萧军的文体选择	(120)
二、论争：萧军杂文创作的巅峰	(123)
三、《我底生涯》和《鲁迅先生书简》	(127)
第四节 力求自然 崇尚真善美：《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 美学思想及其文学贡献	(130)
一、《文化报》美学思想的现代诠释	(130)
二、《文化报》启蒙文学的独特贡献	(135)
第四章 《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139)
第一节 不和谐的前奏：东北解放区的另类文学论争	(142)
一、关于范政小说《夏红秋》的论争	(143)
二、关于严文井小说《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的论争 ...	(149)

三、对袁犀小说《网和地和鱼》的批判	(155)
第二节 边缘与主流的对话：由“王通”引发的冀荳 之争	(161)
一、《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	(163)
二、对萧军“三反问题”的透析	(170)
第三节 隐性霸权的恶果：没有“结局”的结局	(176)
一、退出江湖的游侠	(178)
二、东北作家群的最终解体	(180)
三、昙花一现的新启蒙实践	(183)
第四节 不应再有的续曲：萧军思想再批判	(185)
一、从兄弟争到“冀荳煎”	(186)
二、别样的“朝花夕拾”	(189)
第五章 “《文化报》事件”引发的思考	(196)
第一节 一体化的文学构架：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 的改造	(197)
一、东北地域文学	(198)
二、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方法	(202)
三、对《文化报》文学的改造	(210)
第二节 统一知识分子思想：党对东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改造	(213)
一、文化精神的找寻与恪守：萧军与五四精神	(214)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成功的改造	(220)
结语	(232)
参考文献	(237)
附录一 《文化报》目录索引（部分）	(245)
附录二 《文化报》萧军作品目录索引	(283)
后记	(293)

引 言

白云原自一身轻

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用三郎、田倪、田军等笔名发表作品。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5年出版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第一部正面描写满洲抗日革命战争的小说^①，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一面文学旗帜，在当时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牢不可破的地位”^②。萧军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著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各种体裁作品，加上日记和通信集共计八百余万字。萧军的作品体裁多样，显示了作家极高的文学天分，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萧军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人类解放而奋斗，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自1931年24岁时接触中共地下组织起，他就开始为党工作。曾将住所当作党的联络点，掩护地下党负责同志。1939年萧军到达延安后，积极投入到延安文化工作中，参加鲁艺教学工作，编辑《文艺月报》，并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提出过建设性意见。回到哈尔滨后，为配合党报做好宣传工作，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积极践行新启蒙运动。尽管后来因与《生活报》论争而“因言获罪”，被诬陷为“反党、反苏、反人民”而含冤32载，但是萧军从没有与党离德分心，无负于党和人民，忠诚地以党的“同路人”身份为党工作。

① 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乔木文中有“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

② 陈隄：《萧军的一生》，《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8年第7期。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总是相随相生，萧军及其作品一直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据不完全统计，80年来研究萧军及其作品的论著近10部，论文超千篇。这些著述从不同的角度对萧军进行了研究：或生平，或婚恋，或作品，或思想；有的是平行研究，有的是交叉研究，有的是影响研究，有的是阐发研究。对萧军作品的研究，主要分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和新时期研究两部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主要指《八月的乡村》以其强悍壮阔的美学风骨征服读者后，文艺界对其有力的回应。第二个阶段是新时期的研究，萧军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通观80多年的萧军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有不足和缺憾。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成立了“萧军研究会”，出版了张毓茂、秋石、徐塞等人的多部萧军研究专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萧军研究学术体系。从研究成果上可以看出，作品研究中对小说的研究最多，其次是散文、戏剧，而对诗歌研究的文章最少。这种状况一方面显示了萧军研究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的萧军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的可能。对萧军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在萧军思想的研究上却很薄弱，只有刘芝明批判萧军的小册子《萧军思想批判》以及张如心、李希凡、严文井等人的萧军批判文章。这些著述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失公允的大批判文章，并不能谈得上萧军的思想研究。研究萧军思想，尤其是研究“《文化报》事件”时期的萧军思想，是萧军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研究萧军与“《文化报》事件”是萧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文化报》事件”发生在1948年，是指《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文协”对所谓“萧军问题”的处理、批判。为同《文化报》争夺文艺领导权，受宗派主义严重影响的《生活报》诬陷萧军“反党、反苏、反人民”。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停止对萧军及《文化报》的一切资助，《文化报》被迫停刊。此后，东北开展了数月之久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活动。1981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做出了正式的结论，推翻了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

之词，称其为“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文化报》事件”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萧军被迫离开文坛32年，除经毛泽东批示，萧军的《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得以发表外，这32年萧军几乎与文学界绝缘。“《文化报》事件”也可以看成是主流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场交锋，是党在东北解放区文艺界的试验场，是建构新的文艺体制的一场实验。研究《文化报》，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对萧军研究、东北地域文学思想研究，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对“《文化报》事件”记述的资料不少，既有省市史志、文学史，又有文学专著和学术论文。如黑龙江省志、哈尔滨市志；张毓茂的《萧军传》，王科、徐塞的《萧军评传》，秋石的《聚讼纷纭说萧军》，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和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主编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以及何青志主编的《东北文学五十年》、金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李春燕主编的《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在论文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铁峰、钱理群、徐塞和张毓茂等人的文章，客观地还原了事件真相，反映了历史真实。如铁峰的《对萧军及其〈文化报〉批判的再认识》、钱理群的《批判萧军——1948年8月》、张毓茂的《萧军与“〈文化报〉事件”》、《萧军与“文化报事件”——为萧军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重评“〈文化报〉事件”》等系列文章。这些著述中都提到了《文化报》及“《文化报》事件”，叙述了对萧军《文化报》批判的全过程，指出了《生活报》的谬误。然而所有文章都只是简单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辨析了所谓“三反”的罪名，并没有对事件的实质做根本性的研究。造成这种只记述不研究或简单研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二是《文化报》研究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研究者“没有完整可供研究的《文化报》原本”^①。

^① 参见宋喜坤、张丽娟《〈文化报〉研究资料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文化报》研究资料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对萧军“《文化报》事件”的深入研究,而且还导致以往《文化报》研究的相关著述,甚至一些权威学者的著作文章中的研究资料出现错误。比如关于《文化报》总的期数、办刊时间、与《生活报》论争的时间、《生活报》创刊时间等方面,还存在模糊不清或错误的地方。研究者对一些数据相互借鉴搬用,以讹传讹情况明显。据笔者统计,现今可查阅到的有关《文化报》的记载中,几乎全部认定《文化报》出版的总期数为八十期,即“正刊七十二期,增刊八期,共计八十期”^①。而经笔者查阅《文化报》验证,该报准确期数应为“正刊七十三期,增刊八期,共计八十一期”。同样,《文化报》终刊的时间也出现了“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②和“1948年10月12日被迫终刊”^③两种说法。而事实上,《文化报》第七十三期上清楚地写着出版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即1948年11月25日。不仅《文化报》的研究数据出现错误,就连相关的《生活报》研究数据也出现了错误。《生活报》本创刊于1948年5月1日,但是王科、徐塞的《萧军评传》和王建中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史》中却记载成“1947年夏季创刊”^④,本来是刊登在《生活报》创刊号第二版上的《今古王通》却被无端改在“创刊号头版”^⑤上。甚至连两报论争的时间也被记成“1947年春夏之交”^⑥和“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⑦,而不是原本的1948年秋。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其不确定性却比较容易将后来的研究者引上歧路,造成研究混乱。一直沿用这些不准确的信息,会给《文化报》研究带来负面影响。

① 张毓茂:《萧军与“〈文化报〉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8期。

②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③ 黑龙江史志办:《黑龙江省志·报业志》第50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④ 王建中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⑤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⑥ 徐塞:《萧军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⑦ 张毓茂:《萧军与“〈文化报〉事件”》,《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8期。

对于萧军生平、思想及其作品，当下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成果对于后续研究者启发良多，同时也为本书整个研究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是就现有的研究状况来说，萧军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首先，针对性的专著较少，基本上是个案研究论文的海洋。其次，尽管也有一些著作研究成果问世，但其对萧军思想、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关注还不够，特别是对萧军的“《文化报》事件”缺少统一的认识。最后，尽管前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多学科交叉也进行了很多尝试，但笔者认为对文学与报刊的结合研究，还有待更全面、更深入地挖掘。由此看来，《文化报》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除上述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报》事件”不仅是萧军文学和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文艺界最后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对《文化报》及其事件的研究，既是东北地域文学的文本研究，又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史研究，同时还是对萧军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可以看成对党在东北解放区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

本书以“《文化报》事件”为精神脉络，包含了文本分析、文学事件、文艺思想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运用传播学、社会学、政治文化学、革命心理学、文本细读等方法 and 理论，结合丰富的萧军研究和现代文学史料，以“新英雄主义”和“新启蒙思想”为主线，对《文化报》文本进行系统研究。文中论证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对其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独立品性和精神立场的作用和影响；点明《文化报》上的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分析了《文化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贡献；探讨了两报论争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对萧军和《文化报》的批判既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又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萧军研究领域内第一次对萧军和《文化报》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突破了前学简单论述事件过程及表层原因分析的研究模式。提出“萧军新英雄主义”的概念，指出它不仅是萧军性格核心的概括，而且是他的文艺观和价值观。在对新英雄主义的研究中，用革命心理学理论分析新英雄主义的构建过程，

并提出“双核心思想”和“半步主义”的观点。第二，认定萧军《文化报》的文学活动是一场“新启蒙”实践，它的本质是五四启蒙，而实行新启蒙的方式是“双轨道启蒙”。第三，对《文化报》文学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迈开了《文化报》文学研究的第一步。第四，将东北解放区时期对《夏红秋》《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论争，和对《网和地和鱼》的批判与对《文化报》的批判联系起来研究，指出前者是“《文化报》事件”前奏，有别于以往只是认为对《网和地和鱼》的批判是前奏的提法。以“没有结局的结局”喻指萧军的蒙冤，以“不该再有的续曲”将“《文化报》事件”与“后文革”时期串联起来。第五，对“《文化报》事件”的反思不仅仅局限在萧军性格和宗派主义上，通过研究认为对《文化报》的批判实际上是延安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继续，是延安文学对东北地域文学的改造。最后指出，“《文化报》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构建新秩序中的一个试验场，是民间话语和主流话语的一场正面交锋。

第一章

萧军及其新英雄主义思想

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①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年至1940年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田军）与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等一同列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行列^②；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③，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⑤。由此观之，萧军当时的影响确实很大。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影响，作为一位占据抗战文学先声地位的作家，又身为“鲁门小弟子”，萧军在当时的文艺界有较高声誉，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一个集毁誉于一

① 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

② [美]埃德加·斯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③ 萧军：《萧军全集》第17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1937年5月1日，萧军在《致中野重治》中谈到，鹿地亘对萧军说：“日本的某个杂志把你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

④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萧军在1937年7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正在研究《第三代》，他们是那样的热心研究我，说我是‘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

⑤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39页。萧军1944年12月18日日记，中央党校三部支部书记程谷梁同萧军谈话。原文为：“党方面不是尽看一个人缺点或错误的，比方对于你的功绩，能力，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全是明了的……但有些问题是要双方负责的……”